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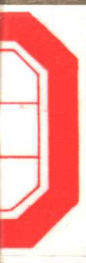
历史学

史学理论卷

主编 于沛

顾问 陈启能 蒋大椿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主
编

于
沛

史
学
理
论
卷

20shijizhong huaxueshujingdianwenku

顾问 陈启能 蒋大椿

历
史
学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

史学理论卷

于 沛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lzu.edu.cn

<http://www.lzu.edu.cn/press/index.htm>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5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2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311-01696-7/K·216

定价:30.00 元

出版例言

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百年，也是学术研究新旧交替、硕果叠出的一百年。其间涌现出的不少学术大师、著名学者及其许多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为中华学术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树起座座丰碑。这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21 世纪中华学术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起点。但是，20 世纪又是新潮激荡、世事纷繁的一百年，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信息的泛滥、人心的浮躁，又使学术园地中嘉卉与莠草同在，美玉与瓦砾共存。久而久之，许多学术瑰宝将有湮没无闻之虞，后学新进则颇费搜寻爬梳之劳。因此，为披沙简金、嘉惠后学，让一代又一代学子能获前贤之薪传，更快地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在咀嚼英华的基础上去更好地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学术事业之发展，我们在广泛征求学界意见的基础上，特邀著名学者为顾问，委托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力求从浩瀚的学术文献中精选出本世纪各学科最具学术价值、最有代表性的经典论文，编为《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作为世纪之交的一份厚礼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经典文库历史学部分的选编工作历时近两年，各位学术顾问和各卷主编本着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严格公正、务求精真、兼容并蓄的原则，广泛搜求、反复比勘，在确保入选论文的科学性、学术性和创新性的同时，又兼顾本世纪各学科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广泛性、各种学术流派观点的多样性、海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互补性；要求入选的论文或能对重要的学术问题提出独到见解，成一家之言，其观点曾对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或在资料的挖掘、整理、考证和运用上极具功力，有重要的建树；或在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对象上有大的突破和创新。总之，它们应能代表 20 世纪不同时期各学科主要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集中反映一百年来中华学术的发展脉络，并可作为学术研究的典范供后来者学习、参考和继承。

由于考虑到广大读者的承受能力，本文库的容量不可能太大。从而使许多学术大家的精品，尤其是长文被忍痛割爱，这使我们深感不安，并怀遗珠

之憾；于是，在无法求全的情况下只能转而力求其精，尽可能确保每一篇入选作品的质量，以乞谅于各位前贤和广大读者。

本文库编选、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及其亲属们的首肯和支持，得到各位学术顾问的悉心指导，也受到学术界众多师友的鼓励和帮助，这些都使我们深受鼓舞。本文库能得以问世，离不开他们的关怀，更离不开诸位主编的辛勤劳作。我们谨在此向一切关心、支持、帮助和参与这项工作的师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库入选的作品均标明原出处，并附每位作者的简介。除对个别长文做了节选、对个别论文略有删节并做说明外，对绝大部分文章都全文照录，仅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标准和规定，对原文中的繁体字、数字和标点符号的用法等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并校改了原文中个别因手民之误造成的错漏。尽管我们已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但由于水平所限，本文库还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恳请学术界各位师友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使它能在再版时做进一步的修订。

惟愿《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能够成为联结昨天、今天和明天几代学人的一座学术桥梁，成为沟通海内外中华学人的一条学术纽带；相信20世纪中华学术的优秀成果一定会在21世纪发扬光大，使中华学术跃上新的巅峰！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

目 录

出版例言	(1)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1900 年以来的历史回顾(代前言)	于 沛(1)
天演进化论	严 复(20)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李大钊(29)
新史学(节选)	梁启超(35)
研究历史的任务	李大钊(51)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瞿秋白(55)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顾颉刚(65)
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	傅斯年(72)
历史研究法	何炳松(80)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郭沫若(97)
论史学之价值	齐思和(101)
历史之重要	章太炎(115)
历史科学论(节选)	朱谦之(120)
历史完形论(节选)	周谷城(140)
社会史导论——生产方式研究与商榷	侯外庐(156)
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变成科学	潘梓年(172)
中国史料的整理	陈 垣(180)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节选)	吕振羽(187)

历史研究法(节选)	吕思勉(207)
历史的形态与例证(节选)	雷海宗(223)
克罗齐的历史学	朱光潜(233)
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	吴玉章(247)
政治经济学史与新史学	王亚南(254)
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范文澜(266)
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 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	胡 绳(278)
有关我国原始社会研究的几个问题(节选)	尚 钺(306)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翦伯赞(321)
论历史人物评价(节选)	吴 晗(339)
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中之史学	钱 穆(350)
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	刘大年(366)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黎 澍(382)
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黎 澍(395)
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节选)	蒋大椿(403)
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	何兆武(423)
世界历史	吴于廑(433)
历史地理学与历史研究	严耕望(456)
史学与世变	沈刚伯(467)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1900 年以来的历史回顾（代前言）

于 沛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上。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史学的衰败，并被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代替，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传播，引起积极的回响，中外史学的撞击、交流和融汇，始终贯穿其间，成为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因之一。本文拟就这一过程的主要阶段的基本内容，及这些内容所反映出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作一初步探讨。笔者以为，这对于中国史学满怀信心地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是大有益处的。

—

20 世纪初，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针对封建史学的弊病发起“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学革命”。他的《中国史叙论》（1901 年）和《新史学》（1902 年）等著作振聋发聩，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任务。中国史学开始脱离二千余年的传统，揭开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序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近代新史学思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应着重指出的是，反映了当时西方史学进步潮流内核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史学理论较之西方一般历史学著作引入中国稍晚，而且在 20 世纪初主要是通过社会学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

进化理论。这是在孔德、斯宾塞的推动下,19 世纪后半期西方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和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在我国引起的直接反响。这批译成中文的著作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学者的著作,如马君武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 年)、^① 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 年)、吴建常从日文本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等。另一类是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日本学者的著作,如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 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1903 年)、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的《社会学》(1911 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强调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是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它不仅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而且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也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梁启超论及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时明确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② 严复、章太炎、康有为等在探讨历史问题时,也都曾把社会进化理论作为重要理论武器。

20 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1905 年,每年达 1~1.5 万人。1909 年庚款奖学金设立后,大批中国学生又赴欧美留学。这些留学生对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不少重要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出版,致使 20~30 年代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20 世纪初期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之前,主要是译介日本学者的著作,而在此之后则主要是直接译介欧美学者的著作。从日文译介的著作主要有:汪荣宝根据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和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人论著编译有《史学概论》,在《译书汇编》第九期上发表;1903 年,浮田和民著《史学原论》有李浩生等六种译本在杭州、上海等地出版。日本学者对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历史思想的研究著作,以及巴克尔的代表作《英国文明史》的部分章节,也译成中文出版。巴克尔是 19 世纪中叶实证主义史学大师,这

^① 严复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先驱,最早引进了社会进化理论。他曾夹叙夹议评价了斯宾塞的名著《社会学原理》,中译名为《群学肆言》(1903 年)。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 4 册。

些译介加速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传播。

20 世纪初西方史学理论引入中国,促使一些中国学者较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历史学的弊病,并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的问题。蒋梦麟认为当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泥古”风气很盛,“著作家在此恶习,集往日之糟粕而美其名曰新历史。教员本此恶习,聚臭腐之糟粕以酿新酒,学子之受之者无异饮鸩毒而甘美酒也”。“欲救斯弊,莫过于弃往日之恶习而革新之。革新之道奈何,曰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体察吾国社会生活之需要,活用吾国历史之资料”。像美国史学家那样,“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从而改变中国史学的落后面貌,使之得以进步。^①朱希祖则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②至于如何建设,不少学者认为首先是“介绍现在西洋史学名著”,以“先明了现代西学的趋势”。这样,从上述认识出发,自 20 年代中期至 30 年代中期,一批颇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名著陆续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有法国朗格诺瓦(Langlois)、瑟诺博习(Seignobos)的《史学原论》(李思纯译,1926 年)、美国鲁滨逊(Robinson)的《新史学》(何炳松译,1924 年)、美国班兹(Barnes)的《史学史》(向达译,1930 年)、美国塞格利曼(Seigman)的《经济史观》(陈石孚译,1928 年)等。

西方史学理论介绍到中国后,使中国史坛耳目一新。当时一些学者充分肯定了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认为这些“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使“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西方史学理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中国史学家所写的一批史学理论著作开始问世,影响较大的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 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 年)、《历史统计法》(1922 年)、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 年)、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 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 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 年)、卢绍稷《史学概要》(1930 年)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介绍和讨论了欧美史学理论与方法,从某种意义上可被认为是对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回响,对当时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教育杂志》1918 年 1 月,商务印书馆编。转引自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第 3 期。

② 朱希祖:《新史学·序》,《新史学》,商务印书馆 1924 年。

在形形色色的西方史学理论中,当时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最为突出。1916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史学和政治学的何炳松归国,次年,他在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1920年至1922年讲授欧洲史时,使用的也是鲁滨逊编订的讲义,广泛地宣传了鲁滨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由于“新史学派”的理论是被当做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特点和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和介绍的,所以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除上述鲁滨逊和班兹(即巴恩斯)的两部名著外,“新史学派”的其他代表作也大多被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巴恩斯的《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及海士(即海斯)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等。不仅何炳松在《新史学》中文版的《导言》中,对鲁滨逊及新史学派的观念倍加推崇,陈训慈、陶孟和、衡如、谷凤池等学者也都在报刊撰文,高度评价“新史学派”。^①他们认为“新史学派”所倡导的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用进化的观点考虑历史变化,强调人类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成长过程,以及明确指出史学的功能是了解现实和预测未来等等,使中国史学家对“科学的历史学”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他们结合中国史学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有的放矢的阐释和发挥,使之成为批判中国封建史学的武器,“建设中国新史学”一时成为颇引人注目的鼓舞人心的口号。

“五四”前后,西方历史哲学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主要有美国杜威(J. Dewey)的实验主义、英国罗素(W. Russel)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德国杜里舒(H. Driesch)的活力论,德国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H. Rickert)的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理论,法国孔德(A. Comte)的实证主义、法国柏格森(H. Bergson)的生活哲学和直觉主义、德国赫尔德(G. Herder)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哲学理论、德国朗普勒西特(G. Lamprecht)的文化史观和德国斯宾格勒(O. Spengler)的

^① 这些文章主要是: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载《史地学报》第1卷1期,1921年11月;陶孟和:《新历史》,载《新青年》第8卷1号,1920年9月;衡如:《新历史之精神》,载《东方杂志》第19卷11号,1922年6月;谷凤池:《历史研究方法之管见》,载《史地丛刊》第1卷3期,1922年2月。

文化形态史观等。上述历史哲学思想集中反映了西方史学中盛极一时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潮,在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章太炎曾指出:历史研究应“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廊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①杜威应其弟子蒋梦麟、胡适等的邀请,在“五四”爆发前三天来华讲学,曾亲历京、沪等地爱国学生运动。胡适认为杜威和他的实验主义对其有终生影响,他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②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似更具体。20年代末,这一理论开始传入中国,1928年,张荫麟译美国学者葛达德和吉朋斯的《斯宾格勒的文化论》在《学衡》杂志发表,引起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重视;到30年代末,中国学者有20余部颇有价值的文化问题的专著出版。^③这些著作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受文化形态史观理论的影响,叶法无在《文化与文明》一书中,有专篇论述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问题的没落》及文化形态史观,并对其详加评述,认为该书是一部“文化史杰作”。^④1933年,朱谦之在《文化哲学》中论述“文化之地理上分布”与“文化与文明”等问题时,也较详尽地探讨了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斯宾格勒的最大贡献,在于区别“文化”与“文明”两种概念。朱谦之结合当时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明确指出:近代欧洲的文化——浮士德文化是宣传权力意志的新教义。“斯宾格勒很痛心于拿破仑以后浮士德的文化变成为浮士德的文明,却不知西洋文化之本质的发展,仍然是一贯的,浮士德的文化必然地变成为浮士德的文明,即所谓非伦理的物

① 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141页。廊氏,即廊模德,今译作孔德;斯氏,即斯宾塞;葛氏,即葛通哥斯,今译作吉丁斯或季廷史(Giddings),美国社会学家。

②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94、97页。

③ 这些著作主要有:叶法无:《文化与文明》,黎明书局1930年;杨东甫编:《本国文化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陈国强:《物观中国文化史》,神州国光社1931年;柳治征:《中国文化史》,南京钟山书局1932年;丁留余:《中国文化史问答》,大东书局1933年;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世界书局1935年上册,1937年下册;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正中书局1936年;陈安仁:《中国近世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此外还有王云五编:《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④ 叶法无:《文化与文明》,黎明书局1930年,第34页。

质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发展”。^①至于西洋文明的特点，则“不但指着理性的科学、物质与财富、工商业的权威、民主政治与普通选举，而且更指着帝国主义的掠夺的性质。文明结果遂产生了一种突然的急速的残忍的世界征服，为历史前例所未有。……但是这种过度的压迫过程，是不会长久下去的，于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征服，遂激起反抗欧洲的世界革命”。^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史学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并出现了以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战国策派”。1940~1941年，陈铨、何永佶、林同济和雷海宗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杂志，后又在重庆《大公报》创办《战国》副刊。此时，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理论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的著述，也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国内来。

早在30年代中期，雷海宗在清华大学任历史系教授讲授西方史学名著时，便选用《西方的没落》作为基本教本。1936年，他以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撰有论文《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后来此文改名为《中国文化的两周》，同其它旧作合编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于1940年出版。该书表明，雷海宗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的理论渊源来自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1946年，林同济和雷海宗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出版，该书汇集了他们在《战国策》上发表的主要文章，集中反映了战国策派的理论和思想。

林同济在《形态历史观》一文中指出，他本人及战国策派的历史观，同文化形态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大凡对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所谓‘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者。”^②在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下，雷海宗、林同济等认为人类的历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独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因而是多元的。作为有哲学意义的历史，即真正的人类历史则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即脱离石器阶段之后。

雷海宗认为人类文化达到高度发展的地区有七个，这七种文化各有其区别于它种文化的特点，因此应强调每一独立的文化为其对象，而不存在着人类统一的历史。这同斯宾格勒的理论同出一辙。林同济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之

① ②朱谦之：《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05页；第213~214页。

②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第7页。

一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他认为“世界史上的大战国时期”在16、17、18三个世纪已渐呈雏形，而本世纪40年代，则可明显看出又一度“战国时期”来临。这一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弱肉强食，没有什么正义、民主可言，同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已是极权主义时代的看法极其相似。当“战国时代”来到时，任何国家都无法躲避歼灭战，小国、弱国“没有幸存的余地”。“这乃是无情的时代，充满了杀伐残忍之风，却也是伟大的时代……人类的大运所趋，竟已借手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们中国人做最后的决定——不能伟大，便是死亡。我们更不得抱着中庸常态，泰然捻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①

战国策派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却占有一席之地，以至半个世纪以后，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②这使人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引入中国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

二

20世纪初，当西方史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时，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留日学生也开始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先导，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1903年，留日学生马君武撰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作者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文末附有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的书单，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③1905年，朱

①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第93页。

② 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近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实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250页；史念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872页；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谈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③ 《译书汇编》第11期，1903年2月16日。

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原理进行了简要的评述^①。此外，“五四”运动前，《共产党宣言》、日本早期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英国社会党主席汉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等论述唯物史观著作的部分章节，也都译成中文公开出版，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②。译者介绍这些著作时所阐述的唯物史观，使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大开眼界，《天义报》记者在《〈共产党宣言〉恩格斯 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译后记中写道：“《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史。”^③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 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明确指出“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④。

1920 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研究著作，那么 1924 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李大钊在深入批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基础上，较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在分析了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后指出：“从来的史学家，单欲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⑤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述有的放矢，矛头指向中国旧史学“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因此他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改造和重作”中

① 《民报》第 2 号，1905 年 11 月 26 日初版。

② 如 1903 年初版于日本的《社会主义神髓》一节，在“五四”前，至少有 3 种中文译本。

③ 《天义报》第 15 卷，1908 年 1 月。

④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678 页。

⑤ 《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199 页。

国的史学，写出新的中国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问题。除李大钊外，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李达、瞿秋白和李汉俊、陈望道等，或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或亲自撰写介绍、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及专著。这对于宣传新文化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①。

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本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问题和农村性质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公开交锋。郭沫若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将这一论战推向高潮，使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更加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积极投身社会和思想文化斗争的实践，在同形形色色旧史学的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并产生愈来愈广泛的影响。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开始关注和研究唯物史观，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这一切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更加广泛地宣传和运用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奠定了基础。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时，中国史学仍一如既往地，甚至是更强烈地受到外国史学理论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占绝对统治地位，所以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研究，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深入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是译介、宣传和学

^① 这些著作主要有：蔡和森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撰有专著《社会进化史》，李达译作有《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和《马克思经济学说》，撰有论文《马克思主义还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专著《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撰有《社会科学概论》、《社会主义大纲》、《帝国主义概论》，陈望道译有《共产党宣言》，李汉俊译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瞿秋白译有《列宁主义概论》等。

习苏联的史学理论及研究实践。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后者似乎影响更深。因为苏联史学在建国初期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往往是全盘吸收和接受苏联学者的某些观点,其中不少重要文章则是直接从俄文转译过来的^①。

为了适应向苏联史学学习的需要,50年代明显加强了对苏联史学论著的介绍工作。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和世界通史教研室自1953年1月联合编译《历史问题译丛》,至1954年6月共出版9辑,内容主要是介绍苏联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结构问题等等。《历史问题译丛》除供高等院校历史系教学参考外,还在整个史学界广为发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对中国历史学界“学习苏联历史科学的最新成果与先进经验,是有一定作用的”^②。

1954年2月《历史研究》杂志创刊后,《历史问题译丛》自7月转由《历史研究》编委会编辑,同时易名为《史学译丛》,由中国科学院公开出版,直至1958年后停刊。《史学译丛》双月刊是史学综合性的翻译刊物,特别是热心译介苏联史学论著学者的园地,该刊以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理论的论文”和“苏联历史学者的学术论著”为主,同时也刊有书刊评价及国外史学消息等^③。以1954年7月出版的创刊号为例,该期发表的10篇文章中,有苏联的《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1号社论《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的科学研究工作》一篇,苏联著名历史学家M.基姆和Г.加里科夫的论文《关于苏维埃社会史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及其他苏联学者的论文7篇,关于苏联史学及民主德国史学研究动态的报道各一篇。以后各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苏联学者的论文在该刊占有绝对的优势。

《历史研究》自1954年创刊到60年代初,先后编译出版有《苏联关于封

① 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批判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为例,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苏联学者的两篇重要论文,科斯明斯基的《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和艾·阿拉布-奥格雷的《阿诺尔德·汤因比的文化史观》分别译成中文,在《史学译丛》1957年第4期和1958年第3期发表。中国学者曹未风在论文《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一》(《学术月刊》1958年第9期),王绳祖在《批判汤因比的历史观点》(《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郭圣铭在《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中,均接受了苏联学者的观点。有的论者直接引用苏联学者的论文,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② 《〈史学译丛〉编辑部声明》,《史学译丛》1954年第1期,第202页。

③ 《〈史学译丛〉征稿简约》,《史学译丛》1954年第1期,封三。